

株洲日报

ZHUZHOU RIBAO

神农周刊

2026年7月12 星期日

丙午年五月廿八

第24400期

今日4版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-0005



知株视频号



株洲新闻网



掌上株洲客户端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

古枫的“救星”

陈之强

龙上,位于攸县东部黄丰桥镇严塘村,是个小山沟,在县境版图上,也见不到一粒微尘。这里四面环山,美景如画。

据史料记载,早在明代(1368-1644),就在“枫树下”为山田相公大王建起了社祀福主庙。庙的右侧和背后有三棵古枫。如果先有古枫再有庙,那枫树的树龄至少有四百年之长。在风水学中,枫树被视为吉祥之树,枝叶繁茂,形态优美,象征生机勃勃,繁荣昌盛。确是龙上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1964年,一名姓罗的外地锯匠师傅盯上这几棵古枫,同当时的生产队队长订下无字合约,达成私下交易,决意将古枫砍掉。那天,罗锯匠带着几个伙计,先在古枫下烧香拜神,求菩萨保佑平安,接着就向一棵大的古枫开刀,动起了斧头。正当此时,陈少康从这里路过,当即大发雷霆,强行阻止,成为古枫的“救星”。

陈少康,烈士后代,父亲陈文棧当年是打土豪闹革命的热血青年,1927年农民运动失败,惨遭杀害,时年仅27岁。少康,个子矮小,身子稍胖,走路老是低着头,说话有点结巴,干农活只会挖山岸、积草皮、犁耙之类的技能活沾不上边。因为有点傻乎乎,都喜欢直呼他“少康魔气”。父亲去世时,他还不足四岁。长大后,读书没天赋,与同祖同辈的祖鞭、循良三人跟父辈仙槎先生读私塾,只念了一册,就自动退学。有次背诵《三字经》,《三字经》里有一句:“三传者(指春秋三传:公羊传、左传、谷梁传),有公羊,有左氏、有谷梁”,他把“有谷梁”背成“有循良”,先生大怒:“有循良,还有少康噢”,顿时便挨了几下竹板。正因为有点傻,六十年代过苦日子时,妻子为生计所迫,改嫁给一位江西老表,妻子带着江西人一道到龙上,妻子骗着二儿子称亲生父亲为“舅舅”,他也认着。后来,一直与大儿子相依为命,有一年,队上分得一张灶芯纸票,28户人家,用量米筒装纸闾,由户主用筷子去夹,已经过了26户,还无人夹中,少康接着夹,恰好让他捞中了。他是烈属、老救济户,队上决定集体出钱,让他买回这七尺米料。难得的好布料,该谁缝衣服,少康作主,缝两条短裤,父子俩一人一条,社员无不叹息:太可惜了!

平时显得有点傻,这回救护古枫却表现得特别清醒,非常精明。他站在庙前,瞪起眼睛,大声追问锯匠师傅干什么,当他知道是来砍伐这几棵古枫时,便将肩上那把生土脚头(挖硬土的锄头),往地上一抖,发出警告:“你们再动一斧,我就同你们拼了!”下马震威得那伙人个个目瞪口呆,不得不将斧头放下。此刻,他深感势单力薄,旋即赶到离现场有里把路远的要婆岑,把正在那儿开荒的男女劳力全部叫来助阵。社员闻讯,立马赶到庙前,你一言,我一语,锄头抖起砰砰响。这伙人只好老老实实,收起行头,灰溜溜地走了。

古枫得救,依然挺拔在福主庙前后,尽管那棵动了几斧的古枫还留有伤痕,树枝稍有老化,还是常年叶茂,生气勃勃。2012年攸县人民政府为龙上境内拥有的古枫挂上了“古树名木、依法保护”的禁砍牌。2022年9月又换成了“湖南省古树名木保护牌”,明令禁止破坏、砍伐、移植。黄丰桥全镇241个村民组,挂牌保护的古树共有328棵,龙上组就占了4棵。

少康虽然离世二十余年,未能能见到政府挂牌保护的情景,但那牌牌里始终深藏着陈少康的名字和功德,这位古枫的救星、生态保护的功臣,已经成为龙上人永恒的记忆。

宋代诗人赵立夫曾写下一首题为《枫》的七言律诗,诗曰:黄红紫绿岩峦上,远近高低松竹间,山色未应秋后老,灵枫方为驻童颜。诗人描绘秋天山林的丰富多彩,赋予灵枫留住青春的活力,与龙上当下的景色多么相似。“灵枫方为驻童颜”的意境和向往,与少康当天救护古枫的心愿,多么一脉相承呀!



挂壁公路“女儿国”

——从烟火繁盛到山居留守的岁月变迁

周新文

在炎陵县中村瑶族乡龙凤村,一条悬于峭壁的挂壁公路缠绕深山,这条蜿蜒陡峭的路连通着曾经远近闻名的“女儿国”,也就是如今的龙凤村九山组、枰山组。

数十年光阴流转,昔日炊烟袅袅、人丁兴旺的村落,如今只剩20余户、30多位留守老人固守故土,热闹一时的“女儿国”渐渐褪去往日繁华,沦为空寂深山里的空巢村落。

“女儿国”之名由来已久,地处罗霄山脉腹地,群山合围、峡谷纵深,早年山高路险、对外闭塞,古时因深山中女子勤劳持家、世代聚居,加上旧时山中婚嫁习俗特殊、本土女性定居居多,被周边百姓唤作“女儿国”。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这里迎来鼎盛时期。彼时挂壁公路尚未完全修通,村民靠山吃山,依托山林竹木、高山果蔬、桃林种植等谋生。漫山桃林层层叠叠,土墙民居鳞次栉比,九山、枰山两个村组聚居上百户人家,家家户户鸡鸭满圈,田间地头春耕秋收,深山里日日炊烟连片。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资源,竹木业、高山蔬果成为村民主要收入,山民守着山林安穩度日,“女儿国”烟火气十足,是深山里富庶热闹的聚居地。

变迁从上世纪90年代末悄然开始。随着国内城镇化浪潮兴起,大山之外的城市化快速发展,外出务工、求学落户成为山里年轻人的新选择。深山交通即便修通了惊险的挂壁公路,但山地耕地零散、种养收益微薄,闭塞的区位限制了产业发展,年轻一代不愿再固守深山。一批又一批年轻人顺着挂

壁公路走出大山,去往株洲、长沙、广东等地务工、安家落户,村落人口逐年锐减。

1940年初出生,现年87岁的曾辛林老人,正是村落变迁的亲历者。老人一家原本8口人,五女一男六个子女在青壮年时陆续走出深山,相继在外成家落户,孙辈、重孙辈也在外地定居,最小的重孙女如今已是11岁,常年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。偌大一栋黄泥土坯老房,只剩曾辛林夫妇两位八旬老人留守。房前柴木码放整齐,屋旁菜园、桃林依旧,但偌大宅院再无满堂子孙的喧闹,只剩两位老人守着祖宅与满目青山。像曾辛林家这样的境况,在现今的九山、枰山已成常态。

时至今日,原“女儿国”片区的龙凤村九山、枰山两组,常住居民仅剩20余户、30余名老人,平均年龄超70岁。青壮年尽数

外流,连片桃林部分撂荒,多数土木老屋人去楼空,唯有挂壁公路依旧盘绕悬崖,默默见证村落的兴衰。

深究“女儿国”由盛转衰的根源,一是地理桎梏,深山耕地稀缺,规模化农业难以落地,传统靠山谋生模式跟不上时代经济发展;二是城乡发展差距,城市就业、教育、医疗资源远优于深山,年轻一代为子女求学、个人发展选择外迁;三是乡土产业断层,传统竹木、水果种植缺乏深加工与销售,难以留住劳动力。

群山依旧青翠,挂壁险路蜿蜒如初,昔日人声鼎沸的“女儿国”,在时代浪潮里慢慢归于静谧。30余位留守老人守着老屋与故土,守着祖辈流传的家国,也守着一个村落远去的繁盛旧梦。



炎陵县中村瑶族乡龙凤村的挂壁公路



“洋火”记忆

王金图

洋火,大抵只有20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才知晓这个名字。

到了供销社,说买盒洋火,营业员丢一盒放柜台上,拿起后匆忙回家,母亲生火做饭、炒菜是少不了这家的什,每到灶眼中火柴盒里快“干净”时母亲总打发我去供销社买洋火,顺带买些洋油、洋碱。因家庭贫困,每次这些东西只能买一点点,用完了再去。有次母亲拿一角二分钱给我三姐去供销社采购,因三姐大大咧咧,途中将一角的纸币丢掉了,仅买回一盒洋火,被母亲揍了一顿,三姐痛哭着蹲在墙角。现在三姐与母亲都到了天堂,不知她俩见面时会不会忆及此事。

从前供销社的洋火,一般放在门边的货架上,可整包卖,也拆开一盒一盒卖。一整包计10盒是两角钱,在农村能买整包的不多,拆零卖一盒是两分钱。我右邻王尧生原在大队任副书记,小学与大队部是一个大门进出,供销社在大门右侧,经常看见他倚在供销社柜台边,问营业员买一盒洋火,然后不慌不忙地划一支,侧着脸儿,半遮着火苗,抽吸着喇叭筒土烟,吞云吐雾一番后,方才潇洒离去。

洋火即火柴,近代中国,由于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,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。彼时,很多日常用品都要漂洋过海从国外进口,那时大凡外国进口的东西名称里都有个洋字,如洋火、洋油、洋灯、洋皂、洋锅、洋伞等。去年5月30日从县城至长沙过端午节,闲来无事,翻出藏书,看到了晚清文人孙玉璋所撰写的《异闻琐录》,内有:“道光间,英夷所贡杂物,多谗巧好玩。中有自来火者,长仅盈寸,一端五色洋药,擦之而火爆发。士大夫见之莫不惊奇,以为鬼物。”加之火柴是英国人沃克在19世纪发明的,这时我才清楚“洋火”之词的来由。

一盒火柴由火柴梗和火柴盒组成。火柴梗为正方形,约1.5毫米见方,由优质的木材制成。火柴盒长约5厘米,厚约1.5厘米,宽约3.5厘米。有段时间也出现过塑料的火柴梗,但没有韧性,擦火时容易弯曲。火柴头比火柴梗粗些,放盒里时一般是两端交错存放,如果顺一头,火柴盒的一端就被撞得鼓鼓囊囊,既不美观又不方便运输。

那时的洋火每盒里大概有百支火柴梗,黑色或红色的火柴头,从盒中抽出来带有一种松木的香味,点燃时又有微呛的硫磺气息。后来才知,火柴头里含有多

种化学物质,火柴盒的侧面涂有红磷、三硫化二锑和玻璃粉,这涂磷的侧面还有防伪止血作用,以前手指或其他地方被割破、扎破,连纸撕下,贴在伤处,既可止血,又可消毒。火柴梗的头上涂有氯酸钾、二氧化锰、硫磺和玻璃粉等,当两者摩擦时,因摩擦产生的热使与催化剂等接触的红磷生火,并引起火柴头上的易燃物燃烧,从而使火柴梗着火。

每打洋火的包装纸,一般是较薄的淡灰色土纸,拿在手里脆响脆响的,那时条件艰苦,留着可写作业,也可如厕,到了供销社总希望能买到每包火柴的最后一盒,这样就能得到包装纸了。

火柴盒也有人专门收藏,我记得有一种火柴盒上,印有一个大大的赫字,大红色的底儿,上面写了一个淡灰色的“赫”,几乎占据了火柴盒正面百分之九十的面积,这种火柴梗是大红色的火柴头,其价格比普通包装的要贵5厘钱。因是喜庆包装,多用在嫁娶等喜事中,平常是不舍得用的。1983年,我在原高枧乡政府工作,一蔡姓好友给我介绍一相亲对象,她在县二中铁路桥右侧侧开了家小商店,里面就进了一批红色头火柴,我问她如滞销怎么办,她笑着回答:咱们自己用呀,后可惜没有姻缘,若干年后碰见她在县人民医院一楼窗口收费。还有一种印有长沙湘江大桥图案的,人虽未亲临现场,但从图案中可见大桥的恢宏气势,底部则印有火柴一厂、火柴二厂的字样。

洋火,最怕受潮,一旦受潮,怎么划都划不着火。常常是丢了盒内的抽匣,但盒的外层也是不舍得丢弃的,留做重复用。

洋火,作为日常用品,占据了很长一段时间。那时候,点火一是火柴,二是用洋油的打火机,再后来,就是气体打火机。如今,在超市、路边小店,都寻不见火柴的影子。

前些年,在外出差或旅游,有些宾馆里还摆了装饰用的火柴盒,里面的火柴头是红色的,只有15根左右,划拉一两根后,觉得很稀奇,便将剩余的带回了家,现在想来,这是对洋火的一种怀念与回忆吧。

今年三月,我二楼的租户其孩子在职校读书,化学作业要用到洋火,他父母转遍了县城的好又多、沃尔玛及其它一些小超市,愣是没有买到火柴。后与我说起此事,无奈将自己的珍藏给了对方一些。



醴陵这座城

龙智明

回家一个月,不同于先前那些居家休假的日子,这段时间四处闲逛,对家乡好像有了些不同的想法。

大一的时候,班主任把我叫去办公室,说是谈谈话聊聊天,类似于新生问答。老师是山东人,很豪爽,说话干脆。说起我的老家,知道是醴陵,老师笑着说:“醴陵我知道,那个瓷都是吧?我朋友前些天还送了我一套醴陵陶瓷,很好看,漂亮大气。”那时我心里莫名很开心。平时为了和别人介绍家乡,必须得把“醴陵”二字写出来,再贴上“陶瓷”“烟花”“醴陵小炒肉”“仙都辣酱鸭”等等标签,才能让对方记住一二。而且往往还要加上两句话——“醴陵和景德镇是齐名的,只是醴陵……”“对,浏阳产烟花,醴陵也产的。”

那时候多么希望醴陵能够大力宣传我们自己的本土特色,至少要像浏阳、景德镇那样吧。

到了我大二那年,醴陵的政府领导们组织文旅局与各商铺举办了許多活动,“醴陵小炒肉”节、“炒粉”节、“检瓷”等活动。在这些活动的推广下,各地的大学生纷纷来到这座小城,感受千年窑火的温度与五彩烟花的绚烂。那时候我还和身边的朋友傲娇地打趣,醴陵没什么好玩的,吃的我都吃腻了……

好像有些人会对自己的家乡有种外在的“嫌弃”,这种“嫌弃”类似于父母“嫌弃”自己孩子的某些生活习惯,但本质上还是爱着的,可能是太熟悉,有点麻木了。

大三实习的时候,在实习学校的门口买了张煎饼吃,闲聊时,摊主问我:“醴陵啊,我知道。醴陵的烟花和陶瓷很出名的,我经常去那里玩,最近还在搞什么烟花展,很期待呢!”那种莫名的开心再次叩击着我的心。像是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欣喜,当然,这不是不太恰当的说法了。

“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。”这是我大一寒假时写寒假社会调查报告时引用的一句诗,出自王维的《杂诗三首·其二》。本义是游子对刚离家的老者的话:您刚从老家出来,理应

知道家乡的人和事。后来我借用过来,扩大了句意,在家乡成长的人理应知道家乡的人物。

醴陵是英雄将领的城市,这里是左权、李立三、耿飚、陈明仁等英雄将领的故乡;醴陵是绿水滋养的城市,醴陵城中心一带为绿水环绕,江水两岸滋养着一代代的百姓;醴陵是文化深厚的城市,渌江书院扎根于此,宋明圣贤曾在这里布道讲学。无论是红色文化、历史底蕴,还是美食风物,醴陵都有足以让人为之停留些许目光的理由。但在所有的理由里,我最喜欢那人间烟火。

近段时间,醴陵油货、炉桥酥接连出名,油货是用糯米粉做成团或环状,下油锅炸至金黄,裹上白糖豆粉,类似于江西南昌的白糖糕,但是比之要更甜腻。炉桥酥则是用面粉做成长方形,中间划上两刀,下油锅炸至金黄,成品呈梯状。冷后略带嚼劲,甜口。无论是哪种,我都爱吃,尤其是菜市场门口卖的那种老式的豆粉,豆粉里还掺些香粉料。

前些天从健身房出来,路过菜市场,嘴馋想买点老家的油货吃,一块钱一个,要来个俩。老人家用筷子夹起三个,说“仔子,再送你一个吃,我这个油货是好吃的。”我没有拒绝,多出的那个帶給家里人尝尝。

到了家楼下,意外见到了隔壁楼的老婆婆。老人家八十来岁了,只要有时间且天气好,就拿着竹扫帚把周围楼落的落叶清扫干净。我爸说,老人家信佛,每逢初一十五就要去庙里,吃斋拜佛,扫地也是一种修行。你看她现在耳聩,听不清周围人的言语,也算是一种福,耳根清净。

在这座小城里,有人在这里安安静静地过着日子,也有人做着轰轰烈烈的梦,期待走出去,大干一场。醴陵这座城,承载了许多的记忆和梦。每个人,尤其是离家又返乡的人,对自己家乡的感情可能都是五味杂陈的。有过酸甜苦辣咸,有过喜怒哀乐,青春在这里萌芽,尘土在这里扎根。家乡这个词,厚重且温情。

千千万万个夜晚,点点霓虹与星光,汇聚成这座城,这是我们的城。